



HENANSHENG GAODENG XUOXIAO
XINGSHI YU ZHENGCE KE
TONGBIANJIAOCAI 2009.8

谢春涛 著

河南省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统编教材

新中国社会主义 60 年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统编教材

新中国社会主义 60 年

谢春涛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社会主义 60 年/谢春涛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 9

河南省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统编教材

ISBN 978 - 7 - 215 - 06846 - 9

I. 新… II. 谢…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1949 ~ 2009—高等学校—教材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41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0)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

字数 26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 元

教学目的与要求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庆祝新中国60年华诞之际,通过本专题的学习,目的是使广大同学了解新中国走过的艰辛历程,了解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立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 十六大以来的全面开拓和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60 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6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60 年历程,有助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前人未曾遇到过的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正确分析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和结果决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经过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的充分发展,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了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前,它一直是党的指导思想。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还被写进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在头绪纷繁的各项工作中,紧紧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环节,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以国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注意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从 1952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行将结束,在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进行打击之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开始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 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细阐述。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总路线提出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就已开始,但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农业集体化进入了发展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1955年夏天以前,虽然在有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给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总的说来,这段时间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合作社80%以上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而且呈现出高级社优于初级社、初级社优于互助组、互助组优于单干户的情况,初步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对手工业进行改造的组织形式主要是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顺利,到1955年年底,建立手工业合作社6.8万个,入社手工业者多达220万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都远远高于同行业的个体手工业者。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年底以前,实行的基本上是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后,由于得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生产规模、技术装备、产品质量、企业利润等都比合营以前有明显的扩大和提高,因而,扩大公私合营的工作进展顺利。开始主要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合营,后来,应中小企业的要求,按行业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再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一部分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具有重大的意义:(1)建立了以生产资料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2)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的变革,它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事情。(3)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从 1956 年到 1976 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所有这一切,都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 1956 年上半年提出的。其主要标志,是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论述了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从 1956 年上半年到 1957 年夏天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多方面的积

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八大前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

1. 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在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当成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2. 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纠正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错误时,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共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强调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3. 开始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要求。中共八大确定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一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并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计划为主体、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安排计划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在经营方面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思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作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的一些具体规定。

4. 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中共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中共同民主党

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提出国家政治生活应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刘少奇论述了如何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的问题。

5. 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也在会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4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此外,这一时期的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还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可以保留一部分私人所有制的论述,关于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的指示,关于学习外国经验和加强、扩大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处理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等。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方面都有所体现。由于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导,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遗憾的是,中共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从 1957 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 1960 年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一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7 年春天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尝试。但是,在

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在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后,党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二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是在错误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了其他领导人集体决定的反冒进,并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国、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地方工业产值要在三到五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等口号和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制定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了工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高指标,从而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上的虚报浮夸。接着,为实现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要求,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其他行业也都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全民大办”。虽然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几次降低了过高的1959年原定指标,但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直到1960年年底才不得不终止。总的说来,“大跃进”运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是党的领导人在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企图用过去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把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三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根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说成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十倍以至几十倍。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各合作社的财产全部合并,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实

行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部分供给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被收归社有。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缩小以至取消商品交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理论与实践。

“大跃进”等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真反思过去几年的工作,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放弃了“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战略。1962年1月至2月和5月,又分别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做出了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决策。

从1961年到1965年,特别是在1961年和1962年,中共中央为调整国民经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二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率;三是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轻工业生产;四是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五是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六是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在政治上,中共中央也开展了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以调整同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此期间,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也有了比较深刻清醒的认识。例如,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经济建设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的关系;不能混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必须注意综合平衡,计划指标要符合实际;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要求;等等。总的说来,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八大前后的一些

正确认识。

遗憾的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错误却再度发展起来。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和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将其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全会公报。

毛泽东作出上述判断,固然有国际国内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如苏联领导人对我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印度军队入侵我国西藏和新疆,台湾国民党当局准备反攻大陆,以及社会上各种犯罪活动增加等。但是,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他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反映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错误看待了其他领导人为克服困难而提出的一些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在1962年8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的中共八届十全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所作的客观分析指责为“黑暗风”,把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指责为“单干风”,把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和彭德怀的申诉等指责为“翻案风”,并把这些都看做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使他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即开始了“反修防修”的实践。国际上,在同苏共的论战中,错误看待了苏联、南斯拉夫等国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将其斥责为“修正主义”;在国内,陆续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念,将斗争矛头逐步指向党内高层,直至中央领导人,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反映了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和国家的纯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中、后期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多次,而 1966 年 5 月 7 日他给林彪的一封信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五七指示),则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他 1958 年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继续发展。

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阻碍,便认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逐步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

尽管没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迷误,为邓小平等所纠正,成为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契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犯错误的反面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促使人们反思和觉醒,重新探寻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在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等人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长达10年的内乱。此后,为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重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正常秩序,解决长时期积累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共中央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尽管如此,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和国家的工作并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这固然是因为在短期内消除“文革”造成的混乱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更重要的还在于,华国锋等领导人提出和推行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在指导思想上延续着“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错误。他们不能够正确解决既要清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难题。

“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受到了全党上下的反对和抵制。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7月,他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此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提出

了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耀邦亲自审定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一些人的严重责难。而邓小平、罗瑞卿、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却相继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胡耀邦等人又组织写作和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这样，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从“左”的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来看待和判定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直接推动下，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第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二，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正式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

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第四,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鉴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长期遭到破坏的惨痛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保障党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五,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过去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邓小平彻底平反。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斗争中,在消除“文革”造成的混乱方面,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华国锋等则因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招致了党内外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批评,不得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此后,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但从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此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近10年的时间内,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1. 破除了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新时期的改革,是首